

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 类型、机会窗口及其未来展望

陆杰华 韦晓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聚焦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语境,本文建构了一个包含数量型性别红利、质量型性别红利、结构性性别红利和转型型性别红利的性别红利类型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机会窗口蕴藏在性别平等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尚未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相叠加、女性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恰逢知识经济兴起,以及女性流动人口增加与第三产业扩张紧密结合的相互作用之中。最后,从家庭结构变迁、女性劳动力价值被低估、家庭化迁移和人力资本不足、女性健康资本损失四个方面探讨制约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性别红利类型; 机会窗口; 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1]03-0060-10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1.03.012

一、引言

纵观改革开放 40 多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独具本土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基于人口再生产模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迅速转变,中国充分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在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生产性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上,通过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逐步释放了人口红利,进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1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新形态^①。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与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扩大的双重压力下,我国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为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带来的新挑战和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亟须更为深入地挖掘人口红利。在此过程中,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的解放和力量的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新型人口红利实现的关键,还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②,性别红利由此引发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概念最早由 Carmen Pages 和 Claudia Piras 于 2010 年提出,将其界定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可以促进当前经济的增长和消除贫困^③。2011 年,联合国妇女署报告《性别红利: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明确指出,尽管劳动力中女性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女性劳动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全球振兴经济背景下女性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④。性别红利自此开始逐步进入学术领域研究视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理解和界定性别红利,对性别红利概念和作用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和深入的过程。初期,学界主要从女性赋权

收稿日期:2021-01-06

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韦晓丹(1992—),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的阶段性成果。

①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②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③Pages Carmen, Piras Claudia, The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blications, 2010, pp.1-36.

④UN Women “The Gender Dividend—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1, <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media/publications/en/unwomenthegenderdividend.pdf?la=en&vs=949>.

和经济收益两个角度定义性别红利,认为性别红利就是给女性赋权,服务于妇女和女童的发展,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发展^①;或是将性别红利界定为利用女性的技能和潜能来保障全球人民有更好的经济 and 更旺盛的生产力^②。随后,性别红利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扩展为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表现为由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参与率提高,不仅有助于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微观上有利于女性个体素质提升和综合发展,在家庭中有利于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增加子女教育投入、消除贫困代际传递^③。更进一步,有学者将性别红利概念与全生命周期概念相结合,指出性别红利是通过对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投资而实现的经济回报,是通过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所产生的新经济效益^④。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对性别红利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强调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以及性别平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性别平等是性别红利形成的必要前提,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是性别红利实现的重要途径。不过,女性地位提升并不必然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1990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3.24%,2000年下降至71.12%,2010年进一步降为63.98%,2019年达到60.45%^⑤。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并不必然伴随着对性别红利的收获,它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支撑条件。例如,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女性劳动力资源根据其具有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得到公平竞争机会,并且能够根据其自身特点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那么,在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中国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性别红利?又该如何准确抓住有利于性别红利的条件,促进性别红利的提升?由此来看,对性别红利的类型、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理解,仍有待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规律而得到进一步厘清。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聚焦于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从宏观层面进一步划分性别红利的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性别红利机会窗口及相应的制约因素,以期进一步充实当前中国性别红利理论研究,并从实践层面为寻找在下一经济发展阶段真正发挥性别红利经济社会效应的主要路径提供方向性的支持。

二、中国语境下性别红利的主要类型

着眼于中国语境重新讨论性别红利的内涵,并非简单、纯粹的概念扩展,而是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从宏观层面梳理和概括性别红利的主要类型,借助对性别红利类型的界定和扩展,更为深入地理解性别红利的作用机制。从宏观上来看,当下中国主要存在着四种性别红利:数量型性别红利、质量型性别红利、结构性性别红利、转型型性别红利。

1. 数量型性别红利

数量型性别红利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参与率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女性稳定且普遍的社会劳动参与是激发性别红利的最基本前提^⑥。一方面,由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女性劳动力供给增加扩大了我国劳动力蓄水池规模,为实现数量型性别红利提供了人口基础;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和社会性别平等的推进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市场有偿工作增量的提升以及女性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有效劳动供给,^⑦使数量型性别红利得到有效释放。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丰富带来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在2000年时,中国女性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就已占据了45.61%的比例^⑧。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第三产业扩张且在GDP中所占比重逐渐超过一二产业之和,女性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迅速转移,2015年女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已达到41%,^⑨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①UN Women “The Gender Dividend—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1, <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media/publications/en/unwomenthegenderdividend.pdf?la=en&vs=949>.

②蒋莱《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③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④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⑤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BRD·IDA)网站公开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

⑥杨菊华《让性别红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潜能》,《中国妇女报》2018年5月22日。

⑦杨云彦、石智雷、张婷皮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人口与健康》2019年第1期。

⑧赵媛媛《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

⑨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公开报告《平等的力量:性别平等如何为全球经济创造12万亿美元的增长》,2015年,<http://www.mckinsey.com.cn/>

2. 质量型性别红利

质量型性别红利是在全生命周期中投资于女性,提高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使女性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收获的性别红利。质量型性别红利实质上是人力资本型的性别红利,是中国语境下需要着重开发的一类性别红利。长期来看,建立在简单女性劳动力利用基础上的“性别红利”并不能长久,只有高素质的女性劳动力才能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适龄女性劳动力规模和比重逐年下降;同时,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来说已经很高,并且在当前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劳动参与容易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显性或隐性的制度性限制、女性在工作 and 家庭中的矛盾冲突等。因此,单纯、片面地强调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质量型性别红利是一种可持续的红利。不同于数量型性别红利主要通过扩大女性劳动力供给,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形成经济增长效应,质量型性别红利特别强调全方位、多层次提升女性人力资本,通过不同质量、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禀赋条件下的女性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使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带来社会平等效应和经济发展效应,在较长的时期内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不仅能够通过提升女性劳动生产率而显著提升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行业分工与性别分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进而提高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最终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自身会不断增值,还具有传递效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会对下一代的教育水平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通过培养一代代更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推动社会总体人力资本的优化、生产和再生产。

3. 结构型性别红利

结构型性别红利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女性劳动力向城市的人口转移所释放出新的生产潜力,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财富。女性劳动力的大量区域型流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性别红利实现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当中,经济发展的城乡和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由此形成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流动劳动力占比迅速上升,从1991年的3.22:1,到1994年的2.29:1^①,到2000年进一步降到1.08:1^②。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已超过一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女性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结构性的女性生产潜力逐步得到释放,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尤其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领域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女性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加快推进城镇化以及农村女性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根据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女性农民工2010年平均月收入为1335元,以2010年CPI为基准,2016年女性农民工实际平均月收入达到3000元,增长达到125%,比男性农民工实际平均月收入增长率高出约10%^③。在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性别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红利,以及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劳动力消费升级产生的红利,都属于结构型性别红利的另一种释放。

4. 转型型性别红利

转型型性别红利是指老年女性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是积极老龄化的题中之意和希望所在,同时也是收获老龄社会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由路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三普”到“六普”期间,我国女性高知老年人^④规模从3.58万人扩大到166万人,在不到三十年间增长了45.37倍,在总体高知老年人占比中从1982年的14.54%上升到2010年的28.7%^⑤。高知女性老年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转型型性别红利的核心所在,具有非常大的再开发价值。基

①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姚先国、胡凤霞《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研究问题综述》,《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7期。

③杨铭、王任远《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性别收入差异——基于动态博弈模型和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经济问题》2019年第9期。

④指60岁及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人口。

⑤朱宇、刘爽《中国城市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分析——兼论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于教育获得性别平等趋势的增长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扩张的“时间压缩”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知老年女性数量和比例扩大的年龄组效应会更为明显。可以预见,随着新一代女性人口进入老年期,将来一段时期内女性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迅速提高。

三、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机会窗口与制约因素

结合中国语境下性别红利的主要类型,释放性别红利的机会窗口,蕴藏在性别平等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尚未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相叠加、女性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恰逢知识经济兴起,以及女性流动人口增加与第三产业扩张紧密结合的相互作用之中。

(一) 释放性别红利的机会窗口

1. 性别平等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为释放性别红利提供必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思想,做出了新部署。习近平指出,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保障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①。“三个平等”是新时代背景下对男女平等内涵的新发展,保障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妇女与社会发展同步,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的认识从以往对权力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关注延伸到对结果平等的关注^②,也体现了国家意志层面性别平等理念的新发展。

在新时代性别平等新理念的指导下,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合法权益、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公共政策体系,为新时代下性别红利的释放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劳动政策层面,我国推动男女同龄退休政策取得新进展。较低的强制性退休年龄是妨碍女性平等参与劳动的障碍之一。2015年,国家开始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实行对外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弹性退休制度,赋予女性选择退休年龄的空间,保障其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我国逐步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延迟退休政策的探索,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延迟女性退休年龄,本质上是消除对老年女性的歧视,承认老年女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下一时期内充分发挥老年女性人力资源打破制度性障碍。在生育政策层面,进一步推动完善两孩政策配套措施,探索建立女性生育的社会和家庭支持体系。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更加完善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构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引导和鼓励全国各地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并实现落地,对切实应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妇女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妇幼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加,保障生育妇女自身长期的发展极为重要。

2. 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尚未进入深度发展阶段,为释放性别红利创造人口环境

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向现代型的转变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近二十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1.8,远低于更替水平^④。生育率下降反映在人口结构上是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少儿抚养比约为60%,在2010年下降至22%,随后保持平稳(详见图1)。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是女性从家庭和生育中解放出来,实现经济独立和个人发展,产生性别红利效应最基本的人口前提。较低水平的生育率和较轻的子女抚养负担可以节省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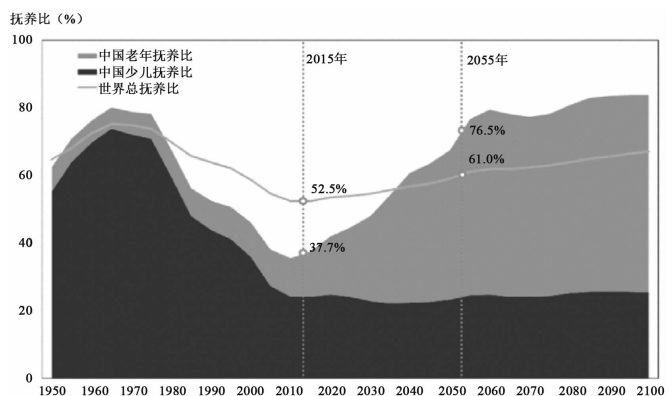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老少抚养比与世界总抚养比发展趋势^③

①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中国妇女伟大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②张小宝《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7年。

④陈卫、段媛媛《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

童保育时间,使得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能够真正摆脱非生产性的家庭劳动,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生产性经济活动过程中,创造大量的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①。此外,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家庭规模缩小是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效应在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教育的增加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使女性可以寻求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破除贫困代际传递^②,也改变了女性劳动力的家庭观念,从而对家庭规模缩小有进一步促进作用^③,为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有利条件,形成持续的循环效应。

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虽然国家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以及一系列有助于降低养育子女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愈加充分,仍然可以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提高总和生育率或者延缓其降低趋势^④;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可能改变的程度不大,将会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根据预测,如果按照中方案完成生育意愿,2021—2100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大约处于1.7—1.8的区间^⑤,少儿抚养比持续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虽然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剧,老年人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增长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但在203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前^⑥,中国老年抚养比仍低于30%,且中低龄老年人比重相对较高,生活尚能自理,整个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相对更长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还不算太高。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未来二十年间,女性承担的总照料负担相对来说较轻,从性别红利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失为一个释放性别红利的契机。

3. 女性受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与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为释放性别红利打造核心要素

性别红利的核心要素是女性人力资本,只有当女性具备一定人力资本时才能实现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的统一,进而创造更好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教育获得。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迅速缩小了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教育发展打破了现实的人力资本制约,改善女性教育获得的劣势地位,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本。首先,女性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使得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本总规模扩大。2019年,中国6岁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04年,与男性的差距缩小至0.56年^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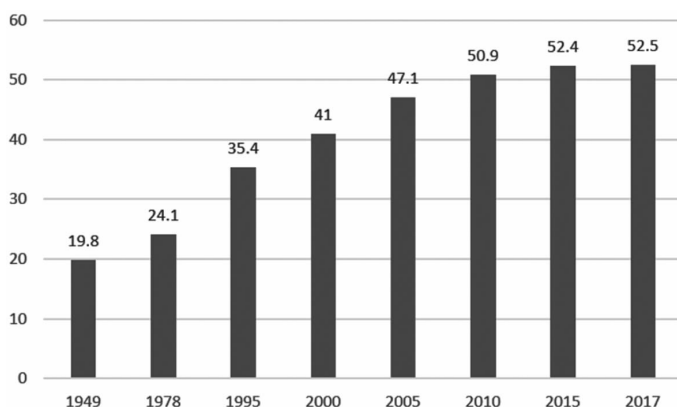


图2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女生比例(%)^⑧

其次,在各个教育层次上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在义务教育阶段,男女童入学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在高等教育中,女性也逐渐显示出相对男性的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女生比例已超过男性,达到50.9%,并且在随后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在2017年达到52.5%(详见图2)。在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女性比例也逐渐与男性持平,2017年女性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已达48.4%,比1985年提高29.8个百分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质的增加成为释放性别红利、尤其是质量型性别红利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女性教育回报率长期以来总体呈增长态势,并且在各个教育层次上普遍高于男性^⑨。女性教育回报率增加意味着投资女性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多的收益,有助于激励社会和

①孙晓芳《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②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③孙晓芳《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⑤王金营、戈艳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

⑥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⑦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

⑧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计算。

⑨陈良焜、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黄志岭、姚先国《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7期;刘泽云、王骏《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的长期趋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家庭加大对女性的教育投资,进而形成持续的正向反馈效应,有利于女性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形成更优质的女性劳动力资源。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意味着接受教育可以解释掉更多的性别歧视,在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提升的背景下也就意味着社会性别平等的新进展。

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数量的提升和女性教育回报率随教育阶段提升的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知识和智力成为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经济元素,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升级和转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和企业对劳动力和劳动潜能的需求发生替换,降低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提升了对脑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要求^①,创造出更多有利于发挥女性特长的产业和工作岗位。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中国女性就业领域进一步拓宽,就业层次升级到软件、金融、网络通信等高科技行业,互联网领域创业中女性比例高达55%^②。在知识经济时代,女性人力资本提高,加上女性注重细节、思维缜密的性格特征,比男性更能胜任电子信息、物流中介、科研教育和公共管理服务^③。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和能力的重视和崇尚以及女性就业层次的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的实现,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4. 女性流动人口增加与第三产业升级,为释放性别红利提供全新路径

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劳动力流动能够产生庞大经济效益。尽管随着人口结构老化,农民工增速放缓且同样呈现出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趋势,“用工荒”问题频现,但在流动人口占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内部,由于结构化的性别差异,目前以及将来一段时期内存在着相当大的性别红利空间。受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增长迅速,“十二五”期间女性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超过40%,成为城镇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其中,实际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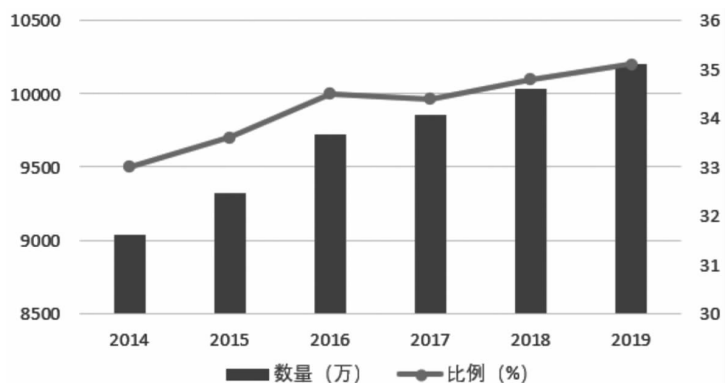


图3 2014—2019 中国女性农民工数量和性别比例^④

的女性农民工规模和比例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为结构性性别红利的实现奠定基本前提(详见图3)。与此同时,在女性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迁而不工”状态,成为可兹利用和亟待挖掘的隐性闲置劳动力资源。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男性流动人口就业率达到94.7%,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率仅为76.8%,未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从数量上来看已接近三千万^⑤。“迁而不工”的女性流动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因素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能够从观念上进一步打破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思想的束缚,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降低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以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人力资源,那么这群规模庞大的“迁而不工”女性流动人口就能成为进一步释放结构性性别红利的重要动力源泉。

如果说女性流动人口显性劳动力和隐性劳动力是实现结构性性别红利的人口基础,经济新常态下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则为女性流动人口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而真正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提供关键平台。从流动人口从业人员行业分布来看,女性流动人口集中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超过56.9%^⑥。第三产业对体力要求不高,女性流动人口从事第三产业不存在天然劣势,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感性特质和亲和力等也与第三产业中很多行业的核心需求点比较契合。而伴随着经济

①杨菊华《让性别红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潜能》,《中国妇女报》2018年05月22日。

②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

③张一兵《第三产业发展中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失落》,《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

④数据来源《2014—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

⑤李国正、高书平、唐孝文《社会投资视角下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⑥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6》,国家统计局。

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迅速扩张,我国劳动力就业将会快速向第三产业集中,为女性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详见图4)。尤其是老龄化深入发展带来老龄产业兴起,老人养老、照护服务,以及与之相对的生育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儿童保育服务需求增长,能够大量吸收流动女性就业人口,政府要对这些行业给予充分的政策倾斜^②。总体来看,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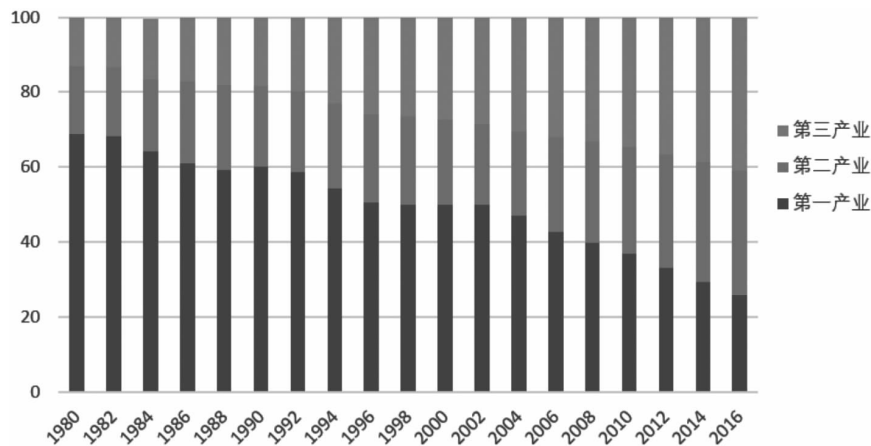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百分比构成(%)^①

中国特色结构型性别红利作用机制的现实,在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环境下,可以预见,女性流动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进一步释放与第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亮点。

(二) 释放性别红利的制约因素

尽管中国性别红利正迎来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但当下中国性别红利的释放仍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制度性、观念性的制约因素。

1. 家庭结构变迁制约数量型性别红利的长期发展

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结构层面上制约数量型性别红利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生育率走低、城市化加速和传统观念的改变,传统家庭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直系家庭比例趋于下降,核心家庭比例逐年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从2000年的56.2%下降至2010年的53.1,并在2014年进一步降为51.5%^③。直系家庭比例下降,核心家庭比例上升是引发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以及它相对于男性劳动参与率更快速下降的最重要的因素^④。对于女性而言,不同的家庭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家庭责任。在中国语境下,家庭责任显然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微观因素^⑤。相比男性,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对家庭结构的反应更为敏感,从而对儿童看护成本的变化也就更加敏感^⑥。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父母会协助女性料理家务,减轻她们的家务负担,从而有助于提高她们的劳动参与率;而随着愈来愈多中青年女性与老年父母分居,老年父母在孙子女看护、家务料理等方面对女儿的协助必然会减少,增加子女看护的机会成本,使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和市场劳动供给下降,进而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⑦。

2. 女性劳动力价值被低估制约质量型性别红利的有效实现

尽管在平均意义上,中国人力资本的性别差距基本消失,但女性的劳动力价值依旧被严重低估,女性劳动力在就业起点、过程和结果等各环节中往往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高门槛、难晋升、低收入的特点依然存在^⑧。女性劳动力价值被低估直接导致存量丰富、质量不断增长的女性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利用效率较低,严重制约质量型性别红利的有效实现。

女性劳动力就业的“高门槛”主要体现为水平层面的职业性别隔离,即男性往往占据了更高层次和收入

①李国正、高书平、唐孝文《社会投资视角下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②周羽中《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女性就业——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③曲嘉瑶、孙陆军《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变化:2000—2006》,《人口学刊》2011年第2期;韦晓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LASS2014数据的验证》,北京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沈可、章元、鄢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人口研究》2012年第9期。

⑤Van De Lippe, Tanja and Liset Van Dijk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omen’s Employment”,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8(2002), pp. 221-241.

⑥杜凤莲《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来自中国非农村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2期。

⑦沈可、章元、鄢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人口研究》2012年第9期。

⑧杨菊华《让性别红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潜能》,《中国妇女报》2018年5月22日。

的职业^②。图5显示,中国女性主要集中于经济业务人员、医疗卫生辅助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纺织加工、饭店旅游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等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层次低、收入低的职业。“难晋升”则主要体现在垂直层面的职业性别隔离上,即在相同的职业中,男性可能总是处于更高级别^③。中国女性在具有明显优势的高声望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中所占比例远低于男性(详见图6)。还有研究显示,随着个体学历的提高,两性之间的晋升机会的差距逐渐扩大,越是接近职业阶层顶端,女性得到晋升的概率越低;即使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结构因素之后,女性晋升的可能性仍然比男性少24.15%^④。这表明女性职位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同时在高层或技术型职位中有技术型鸿沟的存在^⑤。“低收入”是“高门槛”和“难晋升”的必然结果。据统计,2010年女性年平均工资收入仅相当于男性年平均工资收入的60.44%^⑥,收入的性别分层主要来自于职业性别隔离而非性别人力资本差异^⑦。综合来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与规范对女性的文化偏见,以及随之造成的雇主歧视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劳动力市场占位与劳动力市场资源等多方面较之男性的欠缺与劣势,并最终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差异^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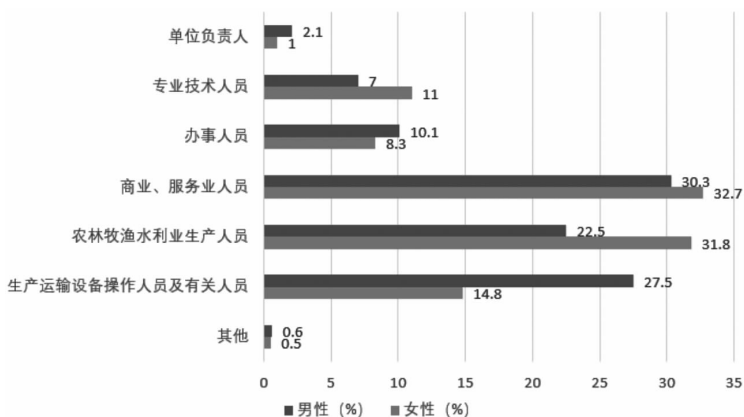


图5 2010年中国女性从业最集中的10个行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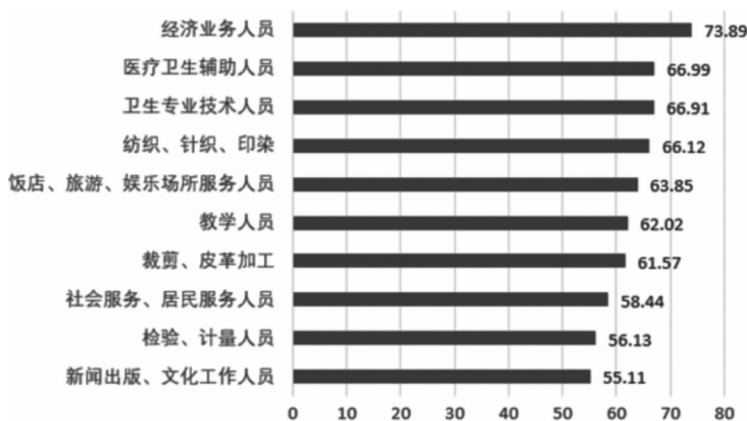


图6 2018年我国分性别的就业人员职业构成^④

3. 家庭化迁移和人力资本不足制约结构型性别红利的有效生产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趋势加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显著增长^⑩。据统计,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最主要的因素是照顾家庭和小孩,占81.3%;而男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最主要因素是“暂时不想工作”,占53.1%^⑪。男性流动人口未就业主要出于个人就业意愿,而女性则并非个人意愿而是为了家务劳动的现象,反映出即使城乡迁移对女性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流动人口家庭中男性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父权制家庭特征尚未被动摇,流动女性被家庭束缚的可能性更大^⑫。一方面,这是由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化思想观念的束缚,女性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以婚嫁随迁为目的进行的家

①数据来源: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②赵媛媛《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

③赵媛媛《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

④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国家统计局。

⑤王存同、余姣《“玻璃天花板”效应:职业晋升中的性别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6期。

⑥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⑦徐若尧《基于CGSS—2015年的收入性别差异实证分析》,《现代商业》2020年第15期。

⑧卿石松、郑加梅《职位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南方人口》2013年第6期;王倩、姜德波《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距的比较与分解》,《南方人口》2017年第5期。

⑨程诚、王奕轩、姚远《职场投入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影响——兼论“出差”的收入效应》,《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⑩李强《“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5期。

⑪李国正、高书平、唐孝文《社会投资视角下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⑫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庭化迁移,在某种意义上对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女性流动人口而言本身就具有依附性特征。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壁垒下社会公共福利体系不完善,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女性流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可获得性差的现象突出,面临更高的子女照料成本问题,提高了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①,使得女性流动人口更易做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选择。与此同时,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不足同样制约着结构性性别红利的有效生产。农村地区女性受教育水平仍低于男性,尤其是农村地区女性在更高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上显著低于男性,这种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农村女性在流入城市后,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无论在工资收入还是职业选择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②。

4. 女性健康资本损失制约转型型性别红利的有效释放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③。受健康劣势的累积效应影响,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在进入老年期时女性相比男性损失了更多的健康资本,严重制约了老年女性人力资本的再开发利用。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1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从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平均预期寿命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分别偏离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程度(分别称为预期寿命缺口和健康预期寿命缺口,负向表明存在缺口),观察性别间健康水平的差异(详见图7)。从中可见,尽管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高的平均预期寿命,但女性老年人的健康余寿却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存在较大缺口,这体现了健康的“性别悖论”。从时间来看,女性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缺口随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男性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缺口却在缩小,表明老年人中健康不平等的现象在扩大。

女性老年人更多的健康损失主要从两个方面抑制性别红利的发挥,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是更高的失能率直接抑制老年女性的再就业和续就业,造成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浪费;二是伴随着女性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和长寿社会来临导致的养老行业供需市场变化,总体来看,处于重度失能的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为社会造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照护负担会逐渐加剧,进一步增加被抑制的性别红利健康财富量^④,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中国语境下从理论到现实的性别红利

马克思曾言: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没有女性的全面参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崛起也将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对中国经济社会增长的贡献举世瞩目;展望未来,中国强而有力的女性力量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且革命性的影响。

聚焦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语境,本文以一个包含数量型性别红利、质量型性别红利、结构性性别红利和转型型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了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机会窗口及面临的主要制约,尝试获得关于中国性别红利的主要类型、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的更全面、准确的认识。然而,性别红利的类型十分丰富,本文只是提供了分析性别红利多维视角中的其中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既能从宏观层面上“数量—质量—结构—转型”的角度来理解,也能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社会—家庭—个人”的层次来理解,还能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理解。

而不论从何种角度、层次和维度来分析和理解性别红利,性别红利都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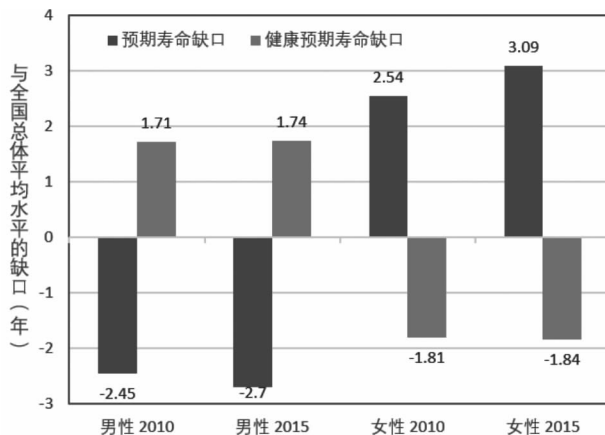


图7 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的性别比较^⑤

①李强《“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5期。

②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③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④郑莉、曾旭晖《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社会》2016年第6期。

⑤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红利具有稳定性。性别红利首先建立在性别结构之上,相对于人口结构,性别结构的变化比较稳定,保证了女性人力资源的长期可靠性。二是性别红利具有可持续性。性别红利的可持续性,既来自于性别红利的稳定性,更来自于性别红利独特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性别平等的不断发展,女性人力资本的不断增值和向下一代的传递,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性的变化等而产生。因此,性别红利不是周期性和临时性的,而是持续和不间断的。一旦为性别红利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就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潜力与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宝贵源泉。^①

基于前述分析,未来进一步深入挖掘性别红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充分发挥性别红利能够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通过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女性流动人口生产潜力的挖掘、对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再开发,使现有和潜在的女性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高效利用,尽可能延展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冲击。其次,深入挖掘性别红利对我国反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女性是脱贫攻坚的重点。一方面,针对女性开展的扶贫项目,不仅关系女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家庭真脱贫、稳脱贫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提升女性地位为扶贫抓手,还有助于加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②再次,性别红利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之一。中国具有庞大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和庞大的女性人力资本潜力,并且恰逢有利于性别红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未来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特色的性别红利可以转化为独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在与西方国家的正面交锋中占据一个意想不到的制高点。

目前中国已经迎来了释放性别红利的重要机会窗口,但要潜在的战略机遇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须辅之以及时、有效的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调整。^③其中,适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能够实现性别红利创造条件、排除阻碍。总体来看,推动性别红利进一步释放的政策制度安排,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基本支撑要素:一是营造性别平等的政策制度环境,保证女性平等参与各项社会经济事务的基本权利;二是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推动教育性别平等实现;三是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增加女性健康资本,推动健康性别平等实现;四是建设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促进女性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五是不断完善家庭生育支持体系,促进妇女“工作—家庭”平衡,解除女性参与劳动的后顾之忧。总而言之,性别红利的收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政策的前瞻性,以及政策之间的匹配性、支持性、协调性等有很高的要求,充分考验国家决策者的智慧。

(责任编辑:陆影)

^①杨菊华《让性别红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潜能》,《中国妇女报》2018年5月22日。

^②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③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